

文才武略

唐宋時期的國家危機與管治精英



文才武略

唐宋時期的國家危機與管治精英

趙雨樂 — 著

責任編輯 程豐餘
美術設計 陳嬋君

書 名 文才武略：唐宋時期的國家危機與管治精英

著 者 趙雨樂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6 字樓

版 次 2014 年 4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特 16 開（152×228 MM）296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531-7

© 2014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言

傳統中國在重要的軍政決策過程中，均重視賢才的出謀劃策，通過集體議事的方式制訂符合國情的解決方案。此種信用人才的原則，建基於古代行之有效的錄用經驗，端賴薦舉、考試等多元途徑，發掘文武俱佳的人物為朝廷服務。在貴族官僚權力穩固的唐代中古時期固然如此，就是在皇帝獨裁權初步建立的宋代，與政治威權基本絕緣的士大夫階層，於保土護國的前提下，也亟欲將個人的思想理論化為可供參詳的強國方略。在唐宋帝王之學與儒家經籍當中，不斷強調國家的昌盛與否，並不止於有無具備擊敗強鄰的軍事實力，更須視乎國家能否隨時應對內外危機，從中有序地進行政經改革。唐廷宋室致力凝聚天下人傑，深信政治與文教互為表裏，彼此集思廣益，決策者才能真正了解國力存在的局限，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機遇。

隋唐帝國結束六朝紛亂而歸於一統，它的成長歷程是曲折多變的。長期在割裂政權下孕育的漢人地方武力，其自固的條件強烈依賴於身處的人文地域，同時不得不考慮與入主中原的胡族政權彼此共融。觀隋末唐初的山東豪傑對李唐皇室的政治向背，便充分說明地方人物可以進入中央權力，軍事能力與政治效忠等因素尤為關鍵，戰爭中領主與元從之間的地域集團意識十分強固。自李淵而世民以後天下大定，新舊政治矛盾陸續浮現，由於表忠的對象不同，武則天政權下開始重用文學之士，打擊關隴貴族的趨勢愈為明顯。從武后以降，經歷中宗和韋后的短暫統治，又回到睿宗、玄宗治下的磨合期間，新舊官僚承受着深刻的政治鍛煉。最後仍然由宰相人才輔助明君，走出宮

廷鬥爭的困局，他們對前朝武、韋政權多所總結，並表現了尊武抑韋的微妙耐葬取向。

在唐代前期律令制還較為堅實下，文臣武將的幹才有着較為明顯的分工，隨着三省六部以及各種寺監功能逐漸被宦官的內諸司機構侵蝕，主導朝政的角度當中，北司宦官便成為不容忽視的一員。事實上，唐代的邊事問題與日俱增，揮之不去的外族壓境，加上藩鎮乘機割據，令唐室疲於中央與地方軍事調動，唯有適應現況，孕育了如樞密使、神策中尉等最高軍政領導層，有別於群臣集體決事的延英殿會議。兩神策和兩樞密對君主效忠與否，幾決定唐國祚之延續，故此時人對北司四貴都有着先入為主的專擅觀念。然而，中晚唐以來保存唐皇室的命脈和維護宦官權力既互為依存，部分闖豎仍深切表露對唐廷的擁護，至五代肇始以後他們又供職於藩鎮之中，對回顧唐亡前夕的政治自然具有不一樣的體會。軍事對置引申出相異的處境考慮，在檢視唐軍與黃巢軍的作戰方略中也顯露無遺。由唐末衍為五代，敵我的城池攻防戰無日無之，朱全忠自黃巢部隊而出，終於建立後梁國度，莫不長期在作戰中尋求一種攻守之道。

從唐末開展的亂局觀之，五代雖為混戰之世，中原的小朝廷內卻存活了大量的文化精英。他們孕育於科舉制度，在政壇上站穩陣腳，開始銳意提拔進士新晉，成功建構文學與政治恩門的人脈關係，凡此對宋代高舉文治方面，奠定了重要楷模。北宋的國策，重文而未嘗輕武，一方面鑑於北方契丹的入侵，武事邊備不能廢弛的緣故，同時也因太祖和太宗出自後周親軍，與各將領之間已然包含密切的軍人紐帶。北宋的深刻危機，發生於承平日久的中期時候，經過數代以後，軍人皇帝與將門之後的神話俱往，宋室只是寄望在儒臣的軍事經略下，配合武將的實地作戰中，產生協同的效應。韓琦、范仲淹和狄青

的文武配搭，被喻為北宋中期的禦邊典範，即在於它能將文武兩組早已分離的才幹之士，通過戰爭經驗的交流，進行守險與衝鋒的任務。在南渡以後的士大夫看來，有為的知識分子亦應與北宋士子志向一脈相承，積極關心國家防禦與社會動員的技術問題。例如事功派的陳亮和葉適，便重視軍事理論的如何實踐部分，為未完成的北伐留下思想注腳。

二十一世紀，研究唐史和宋史的學者，更多強調學術專業的溝通，漸而高度關注於唐五代的中古過渡至宋代的近世期間產生的繼承與變化現象。此種中國歷史時代性質的學術追溯，由內藤湖南為首的京都學派最早提出，從軍事、政治、社會、經濟，以至宗教與哲學、地域與文化等多元角度深入剖析，在現今唐宋史的領域裏，可說是不能不觸碰的治學範疇。筆者在研習的過程中，受此一思想啟導尤深，亡友前中文大學歷史系曾瑞龍教授在這方面心得豐富，兩人曾共撰一篇唐宋軍政研究的述評，以期對此課題作進一步的拓闊。重溫是文，仍可尋索其時治學的心路歷程，以及初步關注的研究重點。本書名為《文才武略：唐宋時期的國家危機與管治精英》，各篇文章主要綴集自多年來個人留意的軍政人物課題。全書按照時序編排，涵蓋唐代、五代而下迄兩宋，其間有沿於變革期理論而鋪陳的，也有不囿於變革說的論述，冀能作為唐宋史研究的資料補充，以加深認識時代危機與人才政治的互動關係。

2013年4月5日

識於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序言

第一章

隋末唐初的政權與豪族： 「山東豪傑」的中日學術解讀

001

第二章

武則天與狄仁傑所論 唐代的治國奇才

031

第三章

中宗至玄宗期的政治輿論： 武、韋政權及其祔葬問題的觀察

053

第四章

兩神策與兩樞密： 唐代北司權力領導新探

077

第五章

中晚唐動盪政局下 「權閹」和「良豎」觀念的形成

103

第四章

唐末五代城池之戰：
從黃巢到朱全忠的戰略檢討

129

第五章

唐宋之際科舉恩門的重建
和進士群體的政治活動

151

第六章

北宋中期推崇的文武禦邊典範：
韓、范戰略與狄青陷陣

187

第七章

南渡與北伐的再思：
陳亮、葉適為代表的事功派軍事理念

215

第八章

唐宋軍政研究的專論與
變革期觀念的構築

239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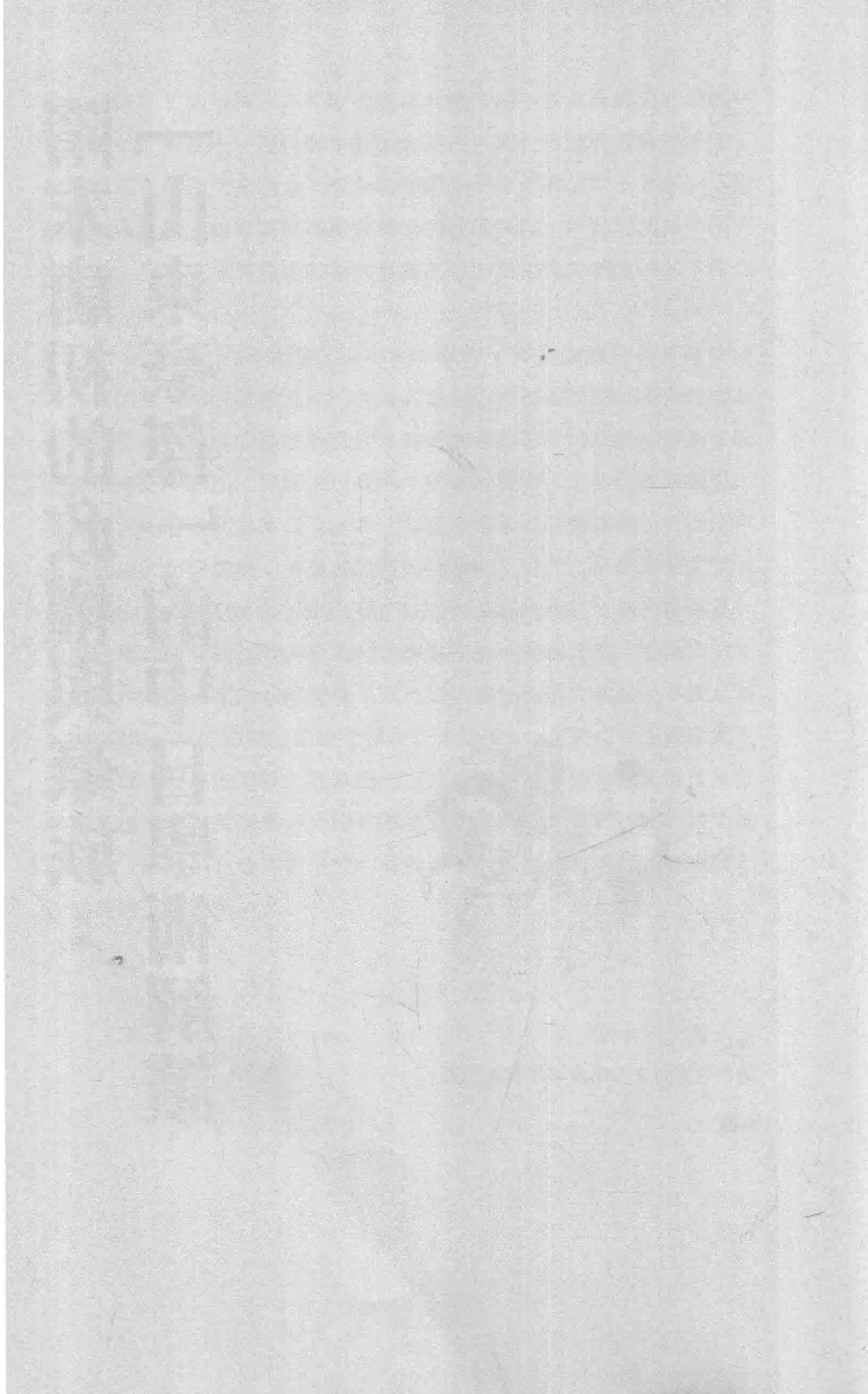
本書各章出處



隋末唐初的政權與豪族： 「山東豪傑」的中日學術解讀

第一○章





引言

中國由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邊疆民族與漢族政權因戰爭關係，長期處於對峙的形勢，而外族逐步向中原推進，也同時造就胡漢民族文化融和的契機。學者陳寅恪（1890-1969）解釋胡漢交融的兩個明顯地域例子，一為建構於關隴的軍事體系，逐步形成唐室和貴族的權力中核，另一個不得不提的，便是偌大的山東地域下各方豪強對李唐領導的向背，二者均對唐代建國產生關鍵的作用。陳氏分析竇建德、劉黑闥、翟讓、徐世勣等山東起義群雄，並活躍於青、齊、徐、兗諸豪傑，初步得出了該區胡人漢化的印象。他以為當地是北魏屯兵營戶所在，其人又驍勇善戰，內中有類於胡人姓氏和胡種形貌，因而推斷此集團應為北魏鎮兵的後裔。惟據日本學者谷川道雄的見解，卻認為山東豪傑有其強固的宗族連繫，由漢人名族率領下層農民進行生產自保，繼而構成一種豪族共同體的可能性較大，意味着這些山東豪傑究為較具胡風的漢人民族而已。從中日學者的分析觀點可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胡化與漢化的趨勢互相發生作用，惟如何斷定某地區民族的胡漢身份，確認該區經歷胡化抑或漢化的過程，以至判明胡漢糅合的程度，依然因史料所限，未能得出全然認同的結論。¹

1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為中國中古史的重要階段，涉及複雜且紛繁的時代性質討論。嚴格而言，且應包括大陸、日本以外，台灣、香港、歐美華人學者研究的所有成果。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就陳寅恪、谷川道雄論「山東豪族」為話題開展的起點，從而初步了解兩者於該地區胡化、漢化進程的史學視野，以期達至一種以小觀大的中日學術理解。事實上，真正深入討論整個「山東豪族」，提出較系統的史觀者亦以兩人為代表，比對他們的史著，尤可帶出民族史研究上孰胡孰漢、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等學理上的差別。至於圍繞此主旨的眾多周邊課題，或宗族、或軍事、或地理、或戶籍，不能顧及之處頗多，行文內容難免以偏概全，萬望方家、學者見諒。

「山東豪傑」類胡的驍勇特性：史家陳寅恪的發微

從國家大一統政治角度而言，自魏晉而南北朝固然為中國的一大動亂時期，惟站在胡漢民族的融和觀之，卻提供尚佳的機遇。而且，由於它處於上承兩漢，下啟隋唐的中間階段，不觸及魏晉南北朝的胡人內徙，並與漢人政權交接等問題，幾無法釐清中原政治制度的淵源及變貌。凡此，均涉及複雜的民族、地理、軍事、語言、文學、文化等資料的通盤考察，非具多門專業知識者，難以駕馭此一重要課題。史家陳寅恪 13 歲東渡日本求學，1910 至 1921 年間分別學習於法國巴黎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及德國柏林大學，1925 年回國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陳氏以其廣博的歷史知識，不單掌握國史的範疇，並從西方強調民族文化移傳的文明遷播角度，提供了自成一家脈絡線索。² 陳氏所見的中國南北朝，不純以亂象蓋棺定論，反而趨向觀察亂象之下富生命力的中華民族如何適應當時的政治氣候，從而重構出新型的國家組織。陳氏博聞強記，對史事融會貫通，在參考書籍極為匱乏的南下時期，仍能建立一套相對整全的史觀，前後寫成《隋唐制度

2 陳寅恪青年時期遊學達十三年之久，學習科目主要為古今各國語文，及中國邊疆民族語文，次及哲學宗教，亦稍涉社會科學。從其論述文獻觀察所得，除美、德、法、日等國語文外，遍習梵文及巴利、希臘、拉丁、波斯、土耳其、蒙、藏、滿文，有些或且甚精，因此被喻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總計陳氏通曉的語文合計共十七種，其外文修養有裨於史學研究者主要在文獻史料比證，迄今最為完全的著作目錄中，陳氏用外文寫成的史學論文，英文有〈韓愈與唐代小說〉（“Han Yu and the Tang Novel”）和〈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兩種，載於《哈佛大學亞細亞研究》，第一、三號（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s. I, III, 1936, 1938）。參閱嚴耕望：〈史學二陳——治史答問一則〉，《大陸雜誌》，第 68 卷 1 期，1984，頁 1-3。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上冊，第八章：「陳寅恪：喜聚異同寧繁毋簡」，頁 236。

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³ 二書所談李唐政權性質與府兵、均田諸制等重要問題，均以精簡明晰的史料勾劃出具體框架，至於民族學上慣用的田野考察，以至錯綜複雜的人文地域變革，均非其下筆時的學術格調。⁴ 為提供至基本的民族流動和交匯情況，陳氏又以歷史人物的活動面貌為觀察主線，重視其人背後的家族發展狀況，以期達至舉一反三的實效。於是，在不少的篇幅內，漢人與漢族，胡人與胡族，即個人與族群諸關係，每歸納在性質相類似的集體解釋上，而漢胡融合的活潑現象，在這樣的模式處理下，遂於解說層面上容易作出系統的處理。

誠如學者許冠三指出，寅恪史學的一大特色，在於運用兩對觀念：一是種族與文化，二是家族和門第，以解說往事的發展脈絡。這四者當中又以文化為樞紐，其生平論史愛以文化為依歸，由文化風尚帶出族群的社會地位和思想意識，顯然這種界定方式有異於西方解讀

3 按陳寅恪考證以精詳見稱，頗主長編考異法所持「寧失於繁，毋失於略」的精神，舉凡筆記、雜錄、野乘和小說，皆在網羅之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939-1940）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941）均成書於兵荒馬亂中，可視為隨緣之作。至1941年12月底日軍攻陷香港，陳氏正執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任客座教授，由是困居九龍半島達半年之久。雖有各種參考的限制，但於分別事類、次序先後方面，仍認為不失長編考異規模，二稿均以舊籍所載及新出遺文合證。《述論稿》且多次採用杜甫、元稹、白居易、韓愈和劉禹錫等人的詩文。參閱《新史學九十年1900—》，頁246-247。

4 這種精簡扼要的寫法，也符合斷代史的學習需要。已故香港學者黃約瑟綜論隋唐五代史研究的趨勢時指出，歷史學在近代中國的成立，與專業教育和研究機構的出現，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1949年以前大學不多，資源有限，學系中政治與經濟不分、文學和歷史無別的情況普遍，以個別朝代為專門論著亦不多。其中，以鞠清遠、陶希聖的《唐代經濟史》，以及呂思勉關於隋唐五代史的專論為有數的例子。戰後隨着大專教育的擴展，學生數目增加，意味着課程的細分化。陳寅恪在戰時所寫《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及岑仲勉的《隋唐史》、傅樂成的《隋唐五代史》，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這種社會背景下的產品，令學習者更能掌握該段歷史的梗概。參閱氏著：〈近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收入劉建明編：《黃約瑟隋唐史論集》（香港：中華書局，1997），頁3-22。

的社會階級理論，故論學愛以不中不西相標榜。⁵ 陳氏析論文化交流素主民族本位論，認為凡「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外，他亦留意文化理想所依託的社會經濟制度，蓋其變動可以解釋王朝的興衰、軍力之強弱和文娛生活的榮枯。陳氏視種族與文化衝突為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論唐代藩鎮患源，釋唐代四裔的興衰等問題，均有法度可循，令閱之者明瞭漢胡文化相處的大勢。⁶ 事實上，胡漢問題的各種討論，在陳寅恪的論著中幾為主線，除經常談及的關隴集團結構以外，較顯著者是關於魏晉江東民族及語言的考證，其次就是對唐代蕃將和雜胡的論析，以及廣涉宗教與地域關係的考析。⁷ 陳氏的〈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一文注目之處，在於是以山東地域為對象的唯一論述，並具體談論與唐初政權攸關的另一中原體系，遺傳着胡漢風俗混雜的獨特生態。⁸ 眾所周知，唐代「山東」地理概念有別於現代理解，它涵蓋今天的河南、河北、山東與山西一帶，隋唐之際，凡涉及冀、定、瀛、相、濟、青、齊、徐、兗諸州，常入於山東範圍，當知時人對此地的理解，不單考慮地理的沿革，更多是循當時

5 前揭《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冊，頁 238-239。

6 參閱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1-44，77-128，159；《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財政篇」，頁 145-160。

7 陳寅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所收〈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說條釋證和推論〉（頁 236-273，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第一分冊）、〈東晉南朝之吳語〉（頁 299-304），〈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頁 371-383，原載《中山大學學報》1957 年第 1 期）、〈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頁 471-472，原載前嶺南大學國文學會《南國》第 2 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頁 150-189，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冊）諸文。

8 該文同時收入《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頁 305-324，原載於《嶺南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

名望士族定居的現實界址所作的地域關聯，從地理學、地圖學的角度來說，並不屬於嚴密的分類方法。⁹ 在該文起首，陳氏清晰表達了寫作動機，其謂：

隋末唐初之史乘屢見「山東豪傑」之語，此「山東豪傑」者乃一胡漢雜糅，善戰鬥，務農業，而有組織之集團，常為當時政治上敵對兩方爭取之對象。茲略引史料，稍為證明，並設一假說，以推測其成立之由來，或可供研治吾國中古史者之參考歟。

隋末唐初豪傑並起，各種地方勢力紛紛聲討煬帝苛暴，或憑藉朝廷舊貴出身，或倚靠在地武裝發跡，一時群雄逐鹿，展開勢力吞併的戰事。考諸史實，山西李淵龍興踐祚以前，為增強本軍實力，不得不首先考慮如何統合山東的叛亂勢力。於是，他多方委派諸子分路出擊，試圖聯合順命歸附的部隊，同時翦除頑強的反抗武力，成為初期李氏精騎作戰的主調。其後在山東武裝勢力支持下，李淵所部日益壯大，不少當地名族均為諸子所用，尤造就世民日後登帝之資。故此，誠如陳寅恪所論，了解山東地域的武裝面貌，於理解唐政權之成立背景具莫大作用。陳氏史識精湛之處，在於觀察到「山東豪傑」於史料

9 北魏時山東士族著姓有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四姓，其後隴西李冲漸貴，所結婚姻等為望族，故此衍成五姓。唐初作《氏族志》以博陵的黃門侍郎崔民幹為天下第一門戶，而李唐得天下，自詡隴西李氏亦為大姓，不下於趙郡李氏，於是又有「五姓七望」之說，即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趙郡李氏、隴西李氏。於此可見，山東士族與關隴士族因政治勢力上升產生地緣的聯絡關係，望族著姓的播遷與追溯，也容易將地界觀念模糊。加上流動性的士族支系漸形分散，與本實望族處於鬆緊不同的變化關係，凡此非純粹的地理舊貌可以全然解釋固定的「山東」地域。

中之頻繁出現，從其集團的務農與善戰等多重習性，並繫於胡漢雜糅的特徵，作一綜合分析，發前人所未發的精義。在鉤沉史料之後，陳氏將此地的豪傑歸為三類：一、竇建德、劉黑闥等，二、翟讓、徐世勳等，三、青、齊、徐、兗諸豪雄。

從第一類而言，作者指出竇建德、劉黑闥均為貝州漳南同鄉，自少相交。劉黑闥以武健見稱，前後為王世充和竇建德任為驍將，此一類別被視為「隋末唐初間最善戰鬥而有堅固組織之集團，實是唐室之勁敵」。高祖鑑於其人反叛，遂派太子建成征討，最後使該處「男子十五以上悉阬之，小弱及婦女總驅入關，以實京邑」，名副其實做到「盡殺其黨，使空山東」。陳氏分析此集團之強固抵禦，與難以馴悍的胡種風尚不無關係。例如建德家世務農，卻自言為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也就是標榜為漢室竇氏貴族的血裔流傳。證諸史料，實為鮮卑紇豆陵氏之改姓而已，亦即為胡種。劉黑闥的劉氏亦為胡人改漢姓中最普遍的一種，而從「黑闥」之名判斷，與北周創業者宇文黑獺之「黑獺」是同一胡語意思，則劉黑闥不單出於胡種，其胡化的程度有過於竇建德。他擁有胡人騎射的強項，故可以任王世充的馬軍總管，又在竇軍中常為斥候，以神勇著稱。

以翟讓、徐世勳為代表的第二類，陳氏認為「在唐初政治上最居重要地位」。考其原因，與此等士族系統相對效命唐室有關。蓋翟讓、徐世勳實以洛陽為其政治信仰的重心，李淵和李密的先世，在周隋以降皆具關隴六鎮柱國大將軍的勳業，地位相當，兩者攻略的對象同時以攻佔洛陽王世充的地盤為決勝關鍵。在翟讓死後，徐世勳實為此系統的領袖，李密攻洛失敗，李世民之實力卻得以堅固，亦因取得洛陽，撫用此等人物協助所致。事實上，「世勳於王世充、竇建德與唐高祖鼎崎競爭之際，蓋有舉足輕重之勢，其絕鄭夏而歸李唐，亦隋

唐間政權轉移之大關鍵也」。此外，當建成、元吉決鬥於長安之時，秦王府中雖多山東豪傑，惟長安一旦變故，乃須倚洛陽為援。故張亮、王保等輩於其間支援世民，廣事招引山東賢能歸附，足證此集團中具跨地域的活動能量。¹⁰此系統中人不乏善戰，卻能為唐室所用，由山東至輔翼洛邑，處事靈活開明，是山東豪傑附和初唐政權的重要支柱。¹¹

對於隋末唐初每見於青、齊、徐、兗諸地的雄豪，陳氏將之歸作第三類討論。他們當中，或為唐室功臣，或為李唐叛賊，政治向背不一，惟從其種姓來源、民族特質，仍可看到相類之處頗多。例如查考兩唐書關於秦叔寶（齊州歷城人）、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程知節（濟州東阿人）、徐圓朗（兗州人）、輔公祐（齊州臨濟人）、李子通（沂州承人）、杜伏威（齊州章丘人）諸傳所記，皆反映隋末青、齊等地的健者頗以馬軍見稱，以勇力連結群眾，或反映與民族遷徙的問題有關。史料所見，彭城之劉世徹、兗州之徐圓朗皆謂徐、兗的豪強，其與竇建德、劉黑闥之間關係至為密切，而從劉黑闥的「劉」和徐世勳之「徐」之相類觀之，兩者民眾存在同於一源的可能。隋末之亂首發於長白山諸豪，該區域並非重兵鎮壓之地，諸豪又為強悍而較有組織

10 玄武門之變中，太宗能利用守衛宮城要隘的山東豪傑常何，剷除建成、元吉，說明世民於此系統中獲得輔助之效。因嘗從建成平定河北，故建成亦以舊部視之而不疑。陳氏考常何之家世，以為皆類於徐世勳，而其與世勳效唐之關係，頗似張亮、張公謹，凡此亦反映集團內部存在着上下提挈的紐帶關係。

11 陳寅恪分析李勣功業，特別強調其地域背景。例如指出太宗晚年，為平衡關隴、山東兩大武力集團的力量，以鞏固李唐皇祚，於是委任長孫無忌及世勳輔佐柔儒的高宗，可謂用意深遠。他又認為「兩唐書以李靖、李勣同傳，後世亦以二李並稱，此就二公俱為唐代之名將而言耳，其實靖為韓擒虎之甥，屬於關隴府兵集團，而世勳則是山東豪傑領袖，其社會背景迥然不同，故二人在政治上之地位亦互異，斯亦治唐史者所不可不注意及之者也。」參閱氏著《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頁314-315。